

社会和历史框架下 20 世纪以来丹麦文学的全景审视：《20 世纪和 21 世纪早期丹麦文学史》研究

A Panoramic View of Danish Literature since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Framework: On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王海波 (Wang Haibo) 李金云 (Li Jinyun)

内容摘要：《20世纪和21世纪早期丹麦文学史》是丹麦科学院院士、南丹麦大学A. M. 梅教授撰写的著作。作者将20世纪以来的丹麦文学分为1900-1940、1940-1970和1970-2015三个阶段进行研究，指出第一阶段主要体现了现代丹麦文学的发生，第二阶段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第三阶段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盛。梅基于相关新历史主义和叙事学理论，将文学置于社会和历史的宏观背景中进行考察，结合出版业、图书馆、媒介等的变化对这时期的文学做了一个全景审视。该著作是现代丹麦文学史的一部力作，有助于读者和学术界深入了解和认知现代丹麦文学，也为文学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20世纪和21世纪早期丹麦文学史》；社会和历史框架；文学史

作者简介：王海波，武汉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文化、外国教育研究；李金云，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西方文论研究。

Title: A Panoramic View of Danish Literature since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Framework: On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Abstract: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is a work of literary history written by Anne Marie Mai, professor i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and member of the Danish Academy. The author divides Danish literature since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ree stages: 1900-1940, 1940-1970 and 1970-2015. The first stage mainly reflect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Danish literature, the second i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st literature, and the third is the prosperity of post-modernist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New Historicism and Narratology, Mai puts literature in the macro background of society and history, and combines

it with the changes of publishing industry, library and media. By doing this, she makes a panoramic survey of literature in this period. This work is a masterpiece of modern Danish literary history, which may not only help readers and academia understand modern Danish literature in depth, but also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to the study and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Keywords: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social and historical framework; literary history

Authors: **Wang Haibo** is Associate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81,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foreig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ducation (Email: wanghb1973@wust.edu.cn). **Li Jinyu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81,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mail: lijinyun@wust.edu.cn).

《20世纪和21世纪早期丹麦文学史》（*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2017，以下简称《丹麦文学史》）为丹麦科学院院士、南丹麦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A.M.梅（Anne Marie Mai）用丹麦语所撰，后被约翰·艾恩斯（John Irons）译为英语出版。该著作对20世纪以来丹麦文学的发展做了全景审视，是近年来丹麦文学史的一部力作。著作出版后，得到欧美学界的广泛赞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指出，作者将文学置于国家宏观的现代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全方位展现了现代丹麦文学的面貌，该著作意义重大，既是现代丹麦文学史，也是丹麦社会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的纳维亚系教授卡林·桑德斯（Karin Sanders）也认为，梅编织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现代丹麦文学地毯，借此国际读者也可以领略复杂多变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丹麦文学的多元发展。¹

在该著作中，梅追溯了19世纪社会历史变化给20世纪文学带来的影响，从作者、作品、读者三个维度，透过社会政治与历史变迁，结合期刊、媒介、公共图书馆、剧院等文化机构的变化，描绘了20世纪和21世纪早期丹麦文学的多样化发展。作者还将该时期的丹麦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分析其所受到的外来影响，尤其是英美法等国文学的影响，指出丹麦文学与欧美文学存在密切的关联。该著作除绪论外，包括进入现代（1900-1940）、超越真实（1940-1970）和跨越世纪（1970-2015）三个部分。

1 参见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一书封底。

一、绪论：写作缘由与理论导入

绪论部分简要交待了《丹麦文学史》一书的写作缘由和立论依据。当前信息化时代，通过网络检索和了解作家或作品变得异常简单，但是要了解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全貌并不易实现，这需要一部全面的、翔实的文学史著作，这正是梅写作此书的缘由。她指出，《丹麦文学史》目的在于勾勒和展现20世纪以来丹麦文学的整体概貌，揭示文学与政治、历史、社会变革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提供作家们的生平与创作全况，展现作家与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¹

该著作的立论依据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提出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主张的叙事学理论。新历史主义并不强调建构关于过去的完整统一的历史，而是基于历史、文学、社会学等多种文本，从不同种类文本之间的互动和间隙中发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就文学史而言，其目的并不在于抽象归纳特定时期文学的统一性和普遍性，而是注重偶然性事件，强调在不停的变化中揭示文学的多元性。格林布拉特曾指出，文学作品是文学、社会与历史相互交织的权力产品，文学研究最适合的方法是打破三者封闭的话语系统，同时沟通作品、作家和读者三方的内部关联，将文学置于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中加以解读。²他写道：“我历来的学术旨趣在于探讨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在于探究特定的文学经典之作如何基于并超越它的时代语境”（Greenblatt 2）。

利科的叙事理论认为，人们经由叙事得以了解遥远的过去，正是叙事使得过往具有意义；但叙事并非外在于历史事实本身，正是叙事才使得那些历史事实得以存在。就文学史而言，文学史的作者不能割断文学与其社会和历史语境的关联，仅仅叙述文学本身。文学与社会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经由文学史的叙事得以呈现，对此，梅写道：“人必须通过某种叙事来确立自己的身份，文化与文学也如此”（9）。故而，文学史通过叙事建构并确立了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复杂关联。

二、1900–1940年：现代丹麦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20世纪以来，丹麦文学进入现代时期，文学发展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梅深入分析了1864年战争、工业化进程、女性获得选举权、文学期刊、新技术等对文学造成的影响，概述了这一时期丹麦文学的最新发展，述评了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呈现了该时期文学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梅首先指出，1864年战争促进了世纪之交历史小说的长足发展。在丹麦历史上，1864年具有特殊意义，这一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发动了针对丹麦

1 参见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17, 7.

2 参见 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Oxford: Clarendon, 1990, 2-3.

的战争，以争夺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两个地区的所有权。结果丹麦战败，损失了约40%的领土，这让丹麦民众的民族自信心严重受损。该历史事件给其后的丹麦文学带来重要影响，作家们不再注重描绘丹麦历史中的浪漫岁月和英雄业绩，而是侧重描写国内长期弥漫的悲观情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V.扬森（Johannes V. Jensen）在1901年出版的历史小说《国王的倒台》（*The Fall of the King*）中，通过讲述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Christian II）政治斗争失败的过程，揭示了其悲剧命运，传递出压抑、消极和悲观的情绪。玛丽·布雷根达尔（Marie Bregendahl）小说《索达尔人1914-1923年间生活图景》（*Pictures of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of Sodal 1914-1923*, 1928），通过主人公的成长经历揭示了1864年战争给丹麦人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描写了人物的瞬时感受，抒发了丹麦人战后压抑失望的民族情绪。另有一些作家以古喻今，借他山之石尝试为当前丹麦社会找到出路。埃米尔·邦内里克（Emil Bonnelycke）在小说《斯巴达人》（*The Spartans*, 1919）中，讲述了英勇机智的斯巴达人不畏艰险，通过各种改革建立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城邦。弗雷德里克·尼加德（Fredrik Nygaard）的小说《维京人》（*The Viking*, 1920）生动地描写了那些维京英雄的事迹，他们不受传统拘囿，对社会制度进行破旧立新，很好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在梅看来，这些历史小说更多关注的是现在，而非历史；它们犹如一面面镜子，映射当下，启发人们通过历史反思当前社会问题，并尝试找到解决方法。¹

其二，梅认为工业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促进了田园文学的产生。19世纪后半叶丹麦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大批农民进入城市谋生，古老悠久的农业文明逐渐被工业文明取代，这促使一些作家开始创作怀念往日田园生活的作品。他们聚焦于先前静谧诗意的乡村时光，描绘了农民简单淳朴的生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亨瑞克·彭托皮丹（Henrik Pontoppidan）的创作主要围绕自然、乡村、普通农民、农业向工业的转型等展开。诗人杰佩·阿克雅尔（Jeppe Aakjaer）和托马斯·拉尔森（Thøger Larsen）创作了许多抒情诗，赞美丹麦古老而悠久的乡村生活。拉尔森在诗作《夏日之歌》（“*Summer Song*”，1923）中讴歌了美好的夏日和农民旺盛的生命力。他写道：“丹麦夏日时光，我如此爱你（……）你快乐的名字犹如童话般美好，/花儿从你根部绽放，犹如火焰般闪烁，/玉米、玉米、玉米，/在明亮的月光下生长和做梦（……）”（Mai 36）²。

其三，梅从女性获得选举权这一政治变革入手分析了女性主义小说的兴起。1901年，自由改革党在选举中获胜，开始了对教育、税收、土地等方面

1 参见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17, 15.

2 本文有关《20世纪和21世纪早期丹麦文学史》的引文均出自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17)，以下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的改革。新成立的教区教会理事会、政府参议会和丹麦议会先后批准女性获得选举权，这是丹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女性的地位、职业和家庭生活等开始引起广泛关注，涌现出一批女性作家，如阿玛莉·斯科拉姆（Amalie Skram）、阿达·朗基勒（Adda Ravnkilde）、奥利维亚·利维森（Olivia Levison）、E. J.汉森（Erna Juel-Hansen）等。这些作家不仅描绘传统女性的家庭关系和生存现状，而且展现了当代新女性的事业追求和精神面貌。不仅如此，这些作家还通过巡回演讲、传记书写等方式展示了当代女性作家的风采，颠覆了人们之前对女性作家的认知，成为丹麦现代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其四，梅认为文学期刊的大量出现促进了短篇小说的快速发展。影响较大的期刊包括：《观察者》（*The Spectator*）、《文学社会》（*Literary Society*）、《卫士》（*The Guard*）、《每周观察家》（*The Weekly Spectator*）、《刀锋》（*The Blade*）、《新土壤》（*New Soil*）等。这些期刊多发表篇幅短小的作品，发行周期短，发行量大，拥有较大读者群，很好地推进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同时，这些期刊也为作家们提供了除大学教师、研究员之外的其他就业途径，并为一些初入文坛的年轻作家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如哈拉德·基德（Harald Kidde）、A. S.莫勒（Agnes Slott-Moller）和奥托·朗（Otto Rung）等。一些重量级作家，如赫尔曼·邦（Herman Bang）、亨瑞克·彭托皮丹、汤姆·克里斯滕森（Tom Kristensen）等此时也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梅分析指出，由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已经不再适合描写零散化的现代精神体验，这些作家对叙事手法进行了大胆创新，这也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¹

最后，梅对丹麦戏剧出现的显著变化也进行了分析。最有影响的剧作家是卡伊·蒙克（Kaj Munk），其作品《伪善说教》（*Cant*）初次上演便获众多好评，并赢得哥本哈根皇家大剧院顾问汉斯·布里克斯（Hans Brix）的青睐。之后，皇家大剧院多次上演他的作品。另一个备受关注的剧作家是凯尔德·阿贝尔（Kjeld Abell），其最杰出的剧作是《安娜·苏菲娅·海德维格》（*Anna Sophie Hedvig*），讲述了一位胆怯善良的女教师不堪女校长的压迫，将其杀死的故事。该剧引起极大轰动，确立了阿贝尔在现代丹麦戏剧史上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无线电的兴起为戏剧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广播剧。许多经典之作被改变为广播剧，广泛传播。第一部影响较大的广播剧是H. C.布莱纳（H. C. Branner）的《死后声誉》（*Posthumous Reputation*）。新出现的广播剧中犯罪剧的影响最大，代表性作品是泰威斯·奈恩戴姆（Tavs Neiiendam）的《谋杀咏叹调》（*The Melody of Murder*）。

梅的创新之处在于打破传统文学史按时间的线性叙事，跨越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的藩篱，将文学与历史、社会变革、政治、技术发展等

¹ 参见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17, 52.

连结，多线索、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这一时期丹麦文学的整体风貌。梅的研究将文学史建构为一个网状结构，呈现了文学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丰富了文学史的叙事方法，很好地推进了文学史相关研究。

三、1940–1970年：丹麦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对丹麦的占领对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战后高速发展的出版业和数量激增的图书馆促进了文学的广泛传播，英美法等国的文学思潮也对丹麦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梅结合具体作家和作品，从这三方面条分缕析地概述了这一时期丹麦文学的发展，呈现了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传播、国内文学与国外文学间的关系，描绘了丹麦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历程。

梅首先指出德国的占领促使了丹麦占领文学的产生。1940年，德国撕毁与丹麦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悍然发动进攻。丹麦猝不及防，随即宣布投降，长达五年的德国占领期由此开始。德国占领期间，专事抵抗的“自由委员会”成立，多位作家积极响应，参与各种抵抗活动，如艾尔莎·格雷丝（Elsa Gress）、索尼娅·豪伯格（Sonja Hauberg）、莫滕·尼尔森（Morten Nielsen）、E.A.扬森（Erik Aalbaek Jensen）、T. S. 汉森（Tage Skou-Hansen）等。二战结束后，一些丹麦作家致力于反映丹麦被德国占领期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梅详细介绍了相关作家和作品。T.S.汉森的首部小说《光秃秃的树》（*The Naked Trees*, 1958/1959）通过一位反抗德国统治的战士的视角，展现了丹麦人民英勇的抵抗运动。E.A.扬森的小说《粉笔线》（*The Chalk Line*, 1976）讲述了东部战线上那些为德国而战的丹麦人返乡后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描绘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大胆触及一些禁忌话题。梅肯定了这部作品，她写道：“扬森敢于从这些人物的视角审视历史，他并没有为这些人的行为辩解，而是详细描写了他们的经历”（79）。值得注意的是，为描摹人物的复杂情感与瞬时感受，作家们开始自发地运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现代主义叙事手法，预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

其次，梅指出平装书的大量出版和公立图书馆数量的激增很好地促进了文学的广泛传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出版社大力推广下，平装书得到社会青睐。锡宁&阿佩尔（Thaning & Appel）出版公司在40年代开始出版幽默文学和中篇小说的平装书，同时也多次出版美国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译作。弗莱迈德（Forlaget Fremad）出版公司出版了流行文学系列平装书，包括凯伦·布里克森（Karen Blixen）、H.C.布莱纳、托夫·迪特莱文森（Tove Ditlevsen）等丹麦作家的作品。平装书极低的价格和极高的发行量使得这些作家迅速拥有大量读者，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普通丹麦民众对文学的热爱。同时，一些出版社开始以平装书的形式翻译引进大量国外的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促进了国内文学的发展。如维腾斯出版公司（Vintens

Forlag) 引进出版了大量存在主义哲学方面的著作, 尤其是萨特的小说和散文; 居伦达尔公司 (Gyldendal) 出版了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的作品; 罗多斯公司 (Rhodos Publishers) 则翻译引进了大量结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著作, 包括罗兰·巴尔特、卡尔·马克思、瓦尔特·本雅明、路易斯·阿尔都塞、梅洛·庞蒂等哲学家的作品。1964年, 丹麦颁布和实施《图书馆法》(The Library Act)。该法律规定, 除学校和原有的中心城区图书馆外, 凡居民达5000人以上的社区须建有公立图书馆, 并配有一名全职的图书管理员。之后, 丹麦公立图书馆的数量剧增。平装书的大量出版和图书馆数量的增加使得丹麦文学获得前所未有的普及, 很好地提高了丹麦民众的文学素养, 也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后, 梅认为受国外文学影响丹麦现代主义文学产生并取得迅速发展。英美法等国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的大量出版开阔了丹麦作家们的视野, 促进了丹麦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梅的著作重点介绍了作家托尔本·布罗斯特罗姆 (Torben Brostrom) 在1959年发表的文章《极端的合理性》(“Immoderate moderation”), 该文首次将“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引介到丹麦, 言辞犀利地批判了传统诗歌的过度理性与千篇一律。布罗斯特罗姆指出, 现代诗歌应充满激情, 应突破和超越传统, 追求多元性和异质性。他写道: “现代主义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 在这个宗教、伦理、政治、社会规范发生巨变的当下, 人性也变得愈发复杂与危险。作家们意识到需要用一种特殊形式的语言来描绘这些变化” (103)。该文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些编辑立即以此为标准挑选适合刊载的作品。《窗花》(Vindrosen) 编辑、诗人克劳斯·里夫比约 (Klaus Rifbjerg) 鼓励一些年轻诗人突破传统, 创作充满激情的作品。这些年轻诗人包括杰西·奥恩斯博 (Jestens Ornsbo)、J.G. 布兰特 (Jorgen Gustava Brandt)、英格·克里斯滕森 (Inger Christensen)、塞西尔·博克 (Cecil Bodker) 等。不仅如此, 他本人也出版了一部现代主义诗歌集《面对》(Confrontation)。这些诗歌主要涉及个体的分裂、主体的危机和语言对现实的重构等。梅指出, 20世纪60年代之后, 现代主义在丹麦意味着创新、严肃、高质量, 它成为文学批评的依据, 决定着哪些作品可以成为文学经典。¹

梅创造性地分析研究了出版业、图书馆等文化机构与文学间的关系, 指出平装书的大量出版和公立图书馆数量的激增一方面有效扩大了读者数量, 提高了文学的普及度, 另一方面促进了英美法等国文学和哲学在丹麦的传播, 开阔了丹麦作家和读者的视野, 促进了丹麦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快速发展。梅详细考察了文学传播对文学的促进作用, 打破了以往文学史研究多注重作家创作这一做法, 丰富了文学史的研究内容, 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文学

¹ 参见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17, 105.

史的多维研究范式。

四、1970–2015年：丹麦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与兴盛

梅在著作中对丹麦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她认为丹麦后现代主义始自1967年创立的期刊《塔》(ta')。在创刊号上,主编埃里克·蒂格森(Erik Thygesen)指出,期刊目的在于探讨后现代主义美学的轮廓和走向。1970年,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及其著作被译介到丹麦,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及其文史哲杂糅的行文风格在丹麦引起巨大反响,促进了丹麦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和发展。其后,丹麦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快速,主要体现在诗歌和小说这两个文类上。梅深入分析了这一时期诗歌和小说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创新,展示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

其一,丹麦诗歌此时出现了一种新的传播形式——咖啡馆朗诵。诗人们在咖啡馆朗诵新创作的诗歌,使得众多顾客有机会接触并欣赏这些新诗,从而有效提升了新诗的读者数量,并促进其广泛传播。当时最有影响的咖啡馆是艺术家K. A.斯蒂林(Kenn Andre Stilling)和朋友们于1980年在哥本哈根创建的维克多咖啡馆(Café Victor)。该咖啡馆之后也成为丹麦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发源地,一些著名的诗人,包括坡·霍霍特(Per Højholt)、比尔茨·奥尔巴克(Birthe Arnbak)、乌菲·哈德(Uffe Harder)等都曾在此朗诵自己的诗歌。

其二,后现代主义诗歌形式方面有较大突破。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拉尔斯·斯金内巴赫(Lars Skinnebach),他在诗歌集《你这个虐待者》(*You Abuser*, 2006)中,通过“批评、玄学、沉默、谐音、忏悔、神启等多种策略将诗人和读者之间的界限抹去”,使得读者无法区分究竟是谁在说话和谁在聆听,说话者和听众的位置模糊不清,并时常交换。¹在2009年发表的诗集《每种意义都是一种矛盾》(*Every Meaning Is Also a Discord*)中,斯金内巴赫专门给读者留下作笔记的空间,诗集中不时出现带有格线的空白页面。丹麦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形式不拘一格,呈现出多种样式。比如,莫滕·索基尔德(Morten Sokilde)的诗歌中出现了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奇妙混合,皮亚·塔夫德鲁普(Pia Tafdrup)的诗歌则是象征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的杂糅,J.C.龚达尔(Jens Christian Grøndahl)的诗歌则混合了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手法,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的欲望、人的无意识等。对此,梅指出,丹麦后现代主义诗歌并无统一样式,诗人们从之前不同历史时期的诗歌样式中进行自由选择,然后以拼贴的方式杂糅于一起,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²

丹麦诗歌这时期也发生了跨界,一些诗人将当时流行的摇滚音乐和说唱

1 参见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17, 147.

2 参见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17, 151.

艺术元素融入诗歌创作中，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梅认为丹·图雷尔（Dan Turell）、彼得·劳格森（Peter Laugesen）和T.S.赫格（Torsten S. Hoeg）等的诗作较具代表性。赫格在创作中将诗歌、音乐、说唱艺术融于一体，于2001年出版了一张诗歌说唱CD，在丹麦引起较大反响。在这张CD中，他以说唱的诗歌形式反映了当下人们的失落感和异化感。在《成长》（“Growing Up”）一诗中他写道：“成长/成长成长直至/沉落/沉落沉落直至/变短/从外向上生长/从下向上浮起/从下到内/从内到外/从外到内/它在那里/那里有它/它过去在那里/那里过去有它”（166）。该诗朗朗上口，简单重复的词句宣叙了诗人单调沉闷的情绪，抒发了诗人难以排解的苦闷。

其三，后现代主义小说取得长足发展。丹麦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略晚于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取得迅猛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梅将小说审美和主题上的新动向概括为四组关系和三个主题。四组关系意指文本与读者、文本与传统、文学与新媒介以及传记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三个主题意指城市化、家庭和跨文化主题。¹

文本和读者间关系的改变在小说审美四组关系中最为关键。梅认为这一改变深受法国文论家罗兰·巴尔特的“作者之死”理论影响。²这时期的小说家不再拘囿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因果直线型叙事，而是运用元小说、戏仿、拼贴、零散化等多种后现代主义叙事技巧，使得小说充满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这些小说中，作者不再是控制文本意义的上帝，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并对文本做出自己的阐释。如小说家S.A.麦德森（Svend Age Madsen）经常在作品中运用迷宫式的多线索叙事方式，赋予作品多种阐释可能，读者需要在多种线索之间做出选择。在梅看来，麦德的小说其实是“反小说”，读者犹如小说的“制图员”，需要在复杂的文本地图中选择并绘制自己的行进路线，并做出自己的阐释。³

文本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梅在著作中引用丹麦文论家迈克尔·斯特伦格（Michael Strunge）的观点，指出传统并非直线发展，后出现的文学样式并不一定取代之前的样式；既往传统构成一个地平线，后来的作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经典的十四行诗、颂诗、现实主义作品仍然可以被当代作家运用。⁴如U.A.奥尔森（Ursula Andkjaer Olsen）在作品中多处插入宗教赞美诗、经典诗歌、谚语、俗语等传统文学与文化片段，使得唯美的古典

1 参见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17, 157-158.

2 参见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17, 159.

3 参见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17, 160.

4 参见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17, 161.

诗歌和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歌曲并置一起，反映出丹麦文化传统的丰富多样性。

文学与新媒介方面出现显著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立图书馆的借阅量大幅下滑，书店销售量也直线下降，许多书店倒闭。但是，网上图书的交易大量增加，电子图书的出版和发行大幅提升。例如，2011年初居伦达尔公司便出版了330余本电子书。

真实与虚构之间失去界限。梅指出，与英美法等国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一样，丹麦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模糊不清，小说与传记、历史融合于一体。¹如作家延斯·布雷斯楚普（Jens Blendstrup）的小说经常混淆真实与虚构，小说中既出现作家自己和其父亲，同时又对他们进行神话处理，将父亲置于上帝的地位，自己则是上帝之子。真实与虚构、小说与传记在此发生了奇妙的融合。他在小说中写道：“上帝最年轻的儿子最终完成了学业。因此，上帝此时履行自己的诺言将其送往北部城市欧登塞学习历史。上帝家中，一个人堕落之前需要接受教育，这是上帝一贯的主张。四个小时的学习之后，就可以在酒吧泡四个小时”（168）。另一位作家K.N.格拉菲（Kristina Nya Glaffey）在小说中将历史上亨瑞克王子的生平事迹以片段形式插入小说中，以此展示丹麦社会关于性别和伦理方面的偏见。真实的亨瑞克王子生平与其他虚构人物的经历并置在一起，使得读者无从判断何为真实、何为虚构。

梅认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城市化、家庭和跨文化这三个主题与1970年以来丹麦的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城市化进程加快，大批妇女成为工业劳动力，丹麦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和文化交往也进一步加深，这一切在文学中都有所反映。小说家亚瑟·克拉西尔尼科夫（Arthur Krasilnikoff）的创作同时涉及这三个主题。两卷本小说《水印》（*Watermark*, 1983-1985）讲述了女主人公从农民转变为工人的过程以及她全家的经历，展示了其复杂的心理历程。关于非洲的小说《夜晚的脊梁》（*The Backbone of the Night*, 1999），讲述了小男孩主人公在父母被害后逃离非洲并在世界各地辗转流浪的故事，揭示了非洲文化和欧洲文化之间的差异。梅对相关的作家进行了分类。关注城市化较多的作家有H.O.约根森（Hans Otto Jorgensen）、克里斯蒂娜·赫塞尔霍尔特（Christina Hesselholdt）和维贝克·格罗恩费尔特（Vibeke Gronfeldt）等；关注家庭主题较多的作家有玛莎·克里斯滕森（Martha Christensen）、N. M. 艾德特（Naja Marie Aidt）、J.C.格罗达尔等；关注跨文化和全球化的作家有穆拉特·阿尔帕尔（Murat Alpar）、安迪尔·埃尔登（Adil Erdem）和金·莱恩（Kim Leine）等。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突出表现是零散化和多元化，作家之间和作品之间的

1 参见 Anne-Marie Mai,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17, 192.

差别较大。梅高屋建瓴，结合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法国文论的影响，集中阐述了这一时期丹麦后现代主义诗歌和小说的多元化发展。梅的研究点线面结合，既交待了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的突出特点，也归纳了丹麦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展现了这一时期丹麦文学的复杂性。

梅的研究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既注重勾勒丹麦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展示其整体风貌，同时也十分注重介绍和凸显重要作家和作品。她在著作每部分的最后均详细介绍了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除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亨利克·彭托皮丹和J.V.扬森和他们的作品外，她还多次论及2006年《政治报》（*Politiken*）和《贝利时报》（*Berlingske Tidende*）发起的读者投票所选出的丹麦20世纪最好的文学作品，包括《国王的倒台》《冬季故事》《其他故事》等。此外，梅还分析了21世纪初以来最有可能进入丹麦经典行列的作家和作品。这个读者投票结果和梅的分析犹如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翔实的阅读导图，读者据此可以领略欣赏20世纪以来丹麦文学的经典力作。该著作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在书中插入许多精美图片，展示了现代丹麦文学中重要的地点、事件、作家等，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丹麦文学史》详实的史料分析和独特的研究视角有助于读者和学术界深入了解和认知现代丹麦文学，也为文学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了有益借鉴。

Works Cited

Greenblatt, Stephen.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Oxford: Clarendon, 1990.

Mai, Anne-Marie. *Danish Literature in th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John Irons. Odense: UP of Southern Denmark, 2017.